

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

011039

西宁卫志

西宁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

西 宁 卫 志

(明) 刘敏宽 龙膺 纂修
王继光 辑注

西 宁 志

(清) 苏 铎 纂 修
王 昱 马 忠 校注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，是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，由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规划整理，青海人民出版社、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。

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互相交往中，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精神财富，它包括历史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宗教、天文、历算、地理、军事、医药、美术、生产技术等。这些精神财富有的用文字记载了下来，有的则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过去从未被系统地整理过，加之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破坏和“左”的思想干扰，损失严重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，指出“整理古籍，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，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。”从而把整理古籍，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。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上述指示精神，抢救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，使广大人民了解和研究青海，更好地为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我们采取边搜集、边整理、边出版的方式，有计划地把青海各少数民族古籍，以

034-3页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的形式，陆续奉献给读者。

少数民族古籍时代的跨度比较大，为了使多数人能够看懂，我们在不影响原貌的前提下，对这类古籍一般都作了标点、分段、注释、繁体字改简化字、翻译（少数民族文字译为汉文）等整理工作，对明显的错误，进行了校正和说明。本丛书一律采用横排，以辑录、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。由于作者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反映到书的内容上难免精华和糟粕并存。这就要求广大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。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以出版青海省各少数民族古籍为主，同时也承担一些根据青海省同兄弟省、市、区协作规划所应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。

青海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刚刚起步，在青海历史上属开创性的工作。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，错误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

1989年5月

西 宁 志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《西宁志》的版本及其价值(代序) | 王 昱(89) |
| 重刊《西宁志》序 | (106) |
| 《西宁志》序 | (109) |
| 《西宁府》序影印件 | (111) |
| 西宁卫全图 | (112) |
| 西宁卫城图 | (113) |
| 重刊西宁卫城图 | (114) |
| 卷一 地理志 | (115) |
| 沿革 内属番彝附 | (115) |
| 山川 | (124) |
| 水利 附桥梁 | (134) |
| 风俗 | (136) |
| 物产 | (136) |
| 古迹 | (140) |
| 卷二 建置志 | (146) |
| 公署 | (146) |
| 学校 | (149) |
| 坛壝 | (151) |
| 祠祀 附寺观 | (152) |
| 驿传 铺舍附 | (160) |
| 卷三 官师志 | (162) |
| 名宦 附员额 | (162) |
| 官记 | (165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土司 | (173) |
| 卷四 兵防志 | (176) |
| 军制 | (176) |
| 堡寨 | (176) |
| 烽墩 | (186) |
| 隘口 | (191) |
| 戎器 | (193) |
| 卷五 岁计志 | (195) |
| 户口 | (195) |
| 屯田 | (195) |
| 解运 课程附 | (197) |
| 卷六 人物志 | (198) |
| 忠烈 | (198) |
| 节妇 | (198) |
| 烈女 | (199) |
| 甲第 | (199) |
| 乡试 | (200) |
| 乡绅 | (200) |
| 卷七 艺文考 | (201) |
| 奏议 | (201) |
| 碑记 | (254) |
| 诗赋 | (301) |

西 宁 卫 志

(明)刘敏宽 龙 膺 纂修
王继光 辑注

辑本《西宁卫志》序

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三卷，辑自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原编第十九册。

青海古称“边外”之地，文献罕征，地志兴起较晚。境内地志之创修，始于明嘉靖间邑人张芝，次则为万历时刘敏宽、龙腾之《西宁卫志》。二志亡佚已久，今存最早的青海地方志当推清顺治十四年（公元1657年）苏铎编纂的〔顺治〕《西宁志》（又名《西镇志》）。嘉靖张志已不复得见。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的失而复出，重现于世，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。虽非全帙，亦足可宝。

兹就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的成书年代、作者、内容及史料价值，略作考述，并附辑注说明，以为序。

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，不见于明人著录。检阅万历年间及万历后编定的明代公私目录，如张萱的《内阁藏书目录》、焦竑的《国史经籍志》、黄虞稷的《千顷堂书目》、高儒的《百川书志》、徐燊的《红雨楼书目》等，均不著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。清修《明史·艺文志》专收有明一代典籍，明志著录约三百八十种，编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为前所未有的古典目录学巨作，然亦不录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。加之是志亡佚久

矣，考定其成书年代及刊刻流布，确有一些困难。

正式著录《西宁卫志》的，为近人张维辑考三陇方志之《陇右方志录》。其书“郡志”部“西宁府”下首先登录了：

“〔万历〕西宁卫志。佚。明万历二十三年兵备道安邑刘敏宽修”^①。此说依据为〔乾隆〕《西宁府新志》，以下小字附注引《西宁府新志》：“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兵备刘敏宽、同知龙膺修《西宁卫志》成。今不特无刻板，即当年印行者，遍觅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。使其尚存，必不似现行《西镇志》之陋劣舛错也。惜哉！”^②

从杨应琚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：第一，《西宁卫志》的作者是刘敏宽、龙膺；第二，《西宁卫志》修成于明万历二十三年（公元1595年）十二月；第三，《西宁卫志》在明代曾槧刻刊行，然传世极稀，至乾隆年间，已湮灭殆尽。经杨应琚多方搜求，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。原卷数已不可考矣。

《西宁卫志》原书亡佚，诸志不载，杨应琚《西宁府新志》所述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《卫志》成书一说殆成定案。后世沿袭不改，至今奉从此说。如1980年出版的《青海历史纪要》说：“青海地区最早的地方志，当推1595年（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）十二月明朝兵备按察使刘敏宽与西宁卫同知龙膺所修的《西宁卫志》。该书现已散失无存。”^③1985年出版的《青海地方志书介绍》说：“《万历西宁卫志》（佚），（明）刘敏宽、龙膺修，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刻

①《陇右方志录》，1924年北平大北书局本，第17页。

②引文见〔乾隆〕《西宁府新志》卷31。

③见《青海历史纪要》，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。

本。”^①然稽考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所录《西宁卫志》，万历二十三年以后明确纪年的材料计有三条。

其一，“铁厂”条：“铁厂在北山五十里。万历二十四年，都御史田乐檄兵备按察使刘敏宽募铁师采矿烧铁。后时不给久，废，塞焉。”^②

其二，“堡塞”之“南川”条下：“万历二十四年，议大修边榷，增置有党兴沟口马营。又八十五里有刺哈山城，增置将领官，通归德路。”^③

其三，“纲领志”^④“已上龙膺志”的最末一条纪事是：“（万历）二十四年，议城刺哈山通归德路。议置玄朔，城于玄朔山西。九月，西宁营哨骑同刺卜尔部蕃御虜于西海之明沙，斩首十五级。海虜永、瓦诸部遁居盐池脑，火酋渡河而南。”^⑤

既然明确纪年的叙事为万历二十四年，而且三条材料的截止年代又不约而同，完全可以判定，《西宁卫志》的成书年代绝不会早于万历二十四年。杨应琚“万历二十三年成书”说既未知何据，又与《卫志》纪年抵牾，显然是一个失误。

^①见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二十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四十二《青海地方志书介绍》，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3月版第27页。

^②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原编第十九册第63页。四部丛刊三编本第23册（下同，不另注）。

^③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原编第十九册第64页。

^④原抄无目，此“纲领志”系辑注者拟加。

^⑤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原编第十九册第51页。

6

辑佚必先辨伪，鉴定佚文的真伪、资料的归属是首要步骤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抄录的《西宁卫志》是否是刘敏宽、龙膺之《西宁卫志》，必须考察辨析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这个辑本的来源，当有所交代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是顾炎武汇钞的一部资料。顾炎武自序云：

“崇禎己卯，秋闈被擯，退而读书。感四国之多虞，耻经生之寡术，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，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，有得即录，共成四十余帙。一为舆地之记，一为利病之书。乱后多有散佚，亦或增补。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，又多往代之言，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。年老善忘，不能一一刊正，如以初稿存之篋中，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。”^①

崇禎己卯为崇禎十二年（公元1639年），是明朝甲申（公元1644年）亡国之前五年，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已风雨飘摇。科举失败的顾炎武，深“感四国之多虞，耻经生之寡术”，抱着经世致用的宗旨，历观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、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，“有得即录”，共成四十余帙。然后析分为二，一为舆地之书，即《肇域志》；一为利病之书，即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因其书未曾先定义例，故直到二书编定时，仍是辑抄的二本原始资料“存之篋中”。据清人钱邦彦依顾衍生（亭林养子）原本，参照张穆本、吴映奎本、车持谦

①《顾亭林文集》卷之六，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第131页。

本、周中孚本、徐松本校补的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^①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的编定，在康熙元年（公元1662年），时顾炎武年五十。如果从始录资料的崇祯十二年起算，共历二十三个春秋。此正与《肇域志》序中所谓“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”^②相合。据此，《西宁卫志》的辑抄年代在崇祯十二年至康熙元年之间。

如前所述，青海境内康熙元年以前的旧志仅有三种，〔嘉靖〕张芝志，〔万历〕刘敏宽、龙膺志，〔顺治〕苏铎志。

〔嘉靖〕张芝志佚名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辑录的《西宁卫志》记事延至嘉靖以后的隆庆、万历，此志非张芝志是不可置疑的。〔顺治〕苏铎志今存，一则书名不符，《利病书》云《西宁卫志》，刊本或著录称《西宁志》或《西镇志》，更重要的是，经稍加比勘，二志的体例、内容相去甚远。《利病书》移录的《西宁卫志》非〔顺治〕苏铎志，也是不容置疑的。而可能性较大的，就是〔万历〕刘敏宽、龙膺志了。

我们判定此志为〔万历〕刘敏宽、龙膺志的证据有四。

第一，书名相同。刘敏宽、龙膺志著录皆为《西宁卫志》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原编第十九册第六十四页首行署“西宁卫志”一处。

第二，纪事年代相符。刘敏宽万历二十三年始任西宁兵备副使，二十五年迁按察使。龙膺万历年先任西宁卫监收通判，嗣迁同知。《西宁卫志》的纂修当在此时^③。《利病书》移录《西宁卫志》的部分涉及明代青海史事很多，大多有明确纪

①见《四部丛刊》三编本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所附，第26册。

②《顾亭林文集》卷之六，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第131页。

③参见《西宁府新志》卷25《刘敏宽传》、《龙膺传》，《明神宗实录》卷291、309。

年，其中，前揭三条材料最迟纪年为万历二十四年。此与刘敏宽、龙膺任职西宁，撰修卫志的时间是吻合的。

第三，明确署名。《西宁卫志》后经人续纂，至少“纲领志”部分有人作过简略的续补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所录《卫志》中的纪事续至崇祯十七年，便是明证。但在原编第十九册第五十一页，万历二十四年与万历二十五年纪事间隔之处有“已上龙膺志”五字，无异明确标示了该志的作者。此为〔万历〕刘敏宽、龙膺《西宁卫志》的力证。

第四，内容与纂修者经历相合。刘敏宽、龙膺任职西宁时期，恰逢明政府派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，整饬兵备防务，招抚番族，以御“海虏”。并相继取得“湟中三捷”的战绩。刘敏宽、龙膺均参预戎事，或筹划兵防，率兵出战，或抚治番族，督运粮草，以功屡受赏赐升迁。这一经历无疑丰富了《西宁卫志》的内容，影响到《西宁卫志》的纂修。《利病书》所录《西宁卫志》反映明代青海军备防务的内容特别突出，尤其是“堡寨”、“峡榨”、“番族”、“四卫”、“海虏”等几部分，甚为详尽。许多记载就是郑洛经略青海时的实际措置，“海虏”一节还附载了长篇的“经略郑洛备御海虏事宜疏略”，时代的痕迹十分明显。这些，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顾炎武辑抄方志资料的宗旨和侧重，另一方面确也能印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抄录的《西宁卫志》就是刘敏宽、龙膺纂修的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。

保存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的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依原抄计，共31页，不足3.5万字。无论从文字上考察，还是从方志编修惯例上推论，远非《西宁卫志》足本是毫无问题的。原抄两种笔体，细玩书法，第四十七页至五十二页计五页系顾

炎武亲笔大字抄录，第五十三页至第七十八页计二十六页为另一人工笔小楷抄就。字体工整清晰，章节错落有致，其堡寨、峡榨、番族、四卫、海虏五节均抬头标目，其余则大致可分卷析目。原抄颇佳，错讹舛误较少。比之于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其它方志之抄，《西宁卫志》相对集中整齐，尚无零乱失次之感。此其《利病书》抄《西宁卫志》之大略。

三

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的卷数、目次已无从稽查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的《卫志》抄本亦无卷目标识。辑本的整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析卷分篇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系未成之稿，原不分卷。未刊之前，辗转抄写，“以意分析，失其元弟”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一百卷，坊刻本一百二十卷。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黄丕烈以为“已失庐山面目”，俱不足信。乾隆五十七年（公元1792年），黄氏得传是楼收藏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原稿本，因据原书面页所标某省府决为原分三十四册（中阙第十四册）^①。四部丛刊三编本遵用黄氏校订的原编册数影印，堪称善本。因此，我们选用了四部丛刊三编本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作为辑佚的底本，其卷目分篇，即依原编第十九册“陕西下”中《西宁卫志》的撮录面目。原抄第四十七页至五十二页是明代青海地区的大事记，故仿《西宁府新志》卷目拟为“纲领志”一卷，不分篇；第五十三页至六十三页是青海境内的山川、古迹、城池的记载，一般都属于地理志的内容，故拟为“地理志”一卷，下隶

^①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黄氏题词。见四部丛刊三编本第十九册。

“山川”、“古迹”、“城池”三篇，篇目均为辑注者拟加，第六十四页至七十八页前有小序，从青海地区的地理、民族环境谈到西宁卫的军事布防，以下依次为堡寨、峡榨、番族、四卫、海虏，分篇清晰，各有篇目，显然自成体系，大体是西宁卫的军事防务、番族部落分布、羁縻四卫及明代中期以后的“海虏”等方面的内容，故拟为“兵防志”一卷，下隶“堡寨”、“峡榨”、“番族”、“四卫”，“海虏”五篇，均系原抄标目。次序上，将原在前面的“纲领志”移后，首“地理志”，次“兵防志”，次“纲领志”，以合方志纂修义例。

“纲领志”前有西宁卫的疆域四至一段，拟为“疆域”篇，移置“地理志”之首。整理后的辑本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计分三卷十篇，目录及各篇大略字数如下：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卷一 | 地理志 | |
| | 疆域 | 约 300字 |
| | 山川 | 约8 000字 |
| | 古迹 | 约4 000字 |
| | 城池（铁厂附） | 约1 000字 |
| 卷二 | 兵防志 | 小序 |
| | 堡寨 | 约2 000字 |
| | 峡榨 | 约5 000字 |
| | 番族 | 约4 500字 |
| | 四卫 | 约1 000字 |
| | 海虏 | 约3 000字 |
| 卷三 | 纲领志 | 约3 500字 |

从这一目录中可以看出，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的主干内容，或者说关于明代青海最有价值的一些材料，均已包括在辑

本《西宁卫志》中了。

乾隆间杨应琚纂修《西宁府新志》，曾多方搜求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，据杨氏自述云：“遍觅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”。如果这一说法可靠的话，我们可以断言，至少《西宁府新志》之“职官志”、“艺文志”，参照了《西宁卫志》的残本。《西宁府新志》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“职官”和“艺文”，很可能是根据《西宁卫志》移录而续补的（关于这一点，将在下文稽考二志关系一节中论及）。那么，辑本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加上《西宁府新志》中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“职官”、“艺文”以及标明录自“卫志”、“旧志”的零星材料，大体上是可以恢复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的原貌的。

四

〔万历〕《西宁卫志》的发现，使我们有可能对青海地区早期的几种方志源流作一考察。

〔顺治〕《西宁志》的基本情况已详校注本《西宁志》的代序；《西宁志》的版本及其价值。正如我们所推测的，无论是甘州分巡道杨春茂纂修之《甘镇志》，还是西宁道苏铎编撰之《西宁志》（一名《西镇志》）、《凉镇志》，均为立国之初，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比较陌生的西北边镇的了解而指令编纂的。内容或出于“上意”，体例自不得随意。仓促属稿，拼凑成书，不免疏漏谬误。学者讥其“了草冗杂，绝无体例”^①，“时有错误”^②，“亦多阙略”^③盖有因也。对照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74“地理类存目”。

②《陇右方志录》张维按语。

③〔顺治〕《凉镇志》张昭美序。